



【别处生活】感知情境的计算

情境感知 (context awareness) 起源于泛在计算,它试图将环境变化与计算机系统联系起来。在泛在计算兴起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计算机系统都是静态的。

在计算的早期阶段,使用系统的环境被安装在计算机的场所定义。计算机用于办公环境或工厂车间,常常由专业人士在专门的机房里操作,计算并非普通人之事,计算机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变化。因此,计算机系统根本没有必要适应不同的环境。

随着手机和手持电脑以及泛在计算的兴起,环境变化刺激了泛在计算,计算设备,并在现实世界中的许多不同情况下使用它们。比方说,去进行一次简单的散步,注意观察周围大量的移动使用场景,你会惊讶于人们使用他们的设备的方式。

在移动计算时代刚刚开始时,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,中心主题是如何使移动设备对用户透明,也即,不论在什么环境下,设备自动提供相同的服务。在这里,“透明”意味着用户不必关心环境的变化,并且可以依靠独立于环境的相同功能。

为了实现具有最佳可用性(也即使用的透明性)的无处不在的计算系统,情境感知被视为一个关键促成因素。计算机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——包括手机、冰箱、烤箱、咖啡机、闹钟、手表等——但是要想做到完全消失,就像马克·威瑟所描绘的泛在计算愿景一样,它们必须预测用户在特定情况下的需求,积极主动地提供适当的帮助。这种能力需要某种意识到其周围环境的感知,即情境感知。

胡泳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【含英咀华】文良颜美荣登封面

钱锺书先生晚年常避免会客,访问更是谢绝,曾说道:“鸡蛋好吃了,何必去见那只下蛋的母鸡呢?”钱氏的本尊难以见到,只能退而看看照片了。我1984年在钱府拍摄的钱锺书杨绛合影,被辗转刊登,如计算知识产权费,颇可赚到几个钱。

读其书,识其人,观其庐山面目,这样的想法人皆有之。胡适那张英俊儒雅的标准照片,就为他赢得一团团的女粉丝。影视明星的靓照艳照,通街通巷都有,他们仍然希望娱乐杂志多登其照,最好是上封面。一般的学者、作家,其玉照登上文学杂志封面的少如凤毛,也因此,近月文友古远清救救的头像出现在某文学杂志的封面,俨然有“荣登”的感觉。

香港的《作家》杂志,其封面曾连续多期让香港作家“荣登”,其封面并不长卷。台湾的《印刻》相对长



黄继雄
香港学者、作家

【拒绝流行】陌生人的善意

陌生人的善意和努力。他参与的公益寻人项目,至今已经成功帮助1万个家庭团圆,弹指间寻人成功率13.67%,最快只用60秒找到走失者。他是个技术控,在他的“寻人辞典”里,没有巧合和传奇,只有技术和信息,借助于科技的高效连接去提高寻人效率。

陌生人是地狱,陌生人也是天堂,“陌生人的善意”制造着罪恶和悲剧,但“陌生人的善意”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,它在某种程度上遏制着那种罪恶。图谋不轨是陌生人,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也是陌生人;让人绝望的是陌生人,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的也是陌生人。当下很多公益寻人项目,借助的都是陌生人的善意所形成的力量。茫茫人海中,他多看了一眼,他收到了信息,他提供了线索,人海形成的精准连接和算法推送,是单个再聪明的、掌握再多信息的人也无法超越的。它打破了一个个信息孤岛,在无数陌生人之间链接成一个有温度的信息链,让寻亲者找到亲人的踪迹,帮他们找到回家的路。



曹林
北京时事评论员

【生活速写】过羊城

广州的闷热是让我畏怯的。去年5月20日,为了去广西贺州办展览,于是路过久未造访的羊城。天刚亮就起来,一路奔波,从家里搭出租车到捷运站,再搭捷运到台北车站,走路去机场捷运,摇摇晃晃到了桃园机场第二航厦,办理登机手续,托运行李,安检出关,坐上海南航空靠窗的狭窄的座位。飞机将起未起。发动机隆隆作响。戴上耳机,用循环播放的贝多芬的乐音压制不住的噪音。直到起飞前,按规定拿下。一路昏沉。醒过来时,把进机舱前随手拿的《参考消息》与《环球时报》也大概浏览了。

飞机终于下降,平安降落在白云机场。出关后,东转西问,好不容易才找到顺风快递的收货站,把近5公斤有关“2·28”的书寄到北京清华园给写论文要参考的人,然后走出去抽根烟。

自动玻璃门随着我的脚步往两边退让,羊城湿热的空气便迎面扑来。在禁烟区外的路边点支烟。马路对面,高架桥下的安全岛上,一名劳动者正冒汗修剪带着厚厚尘土的不知名的观赏树丛的枝叶。各种噪声聚拢入耳。于是戴上耳机,略略调高音量,赶紧把烟蒂捻熄丢到白铁垃圾箱里,回到送着冷气的航站楼里。

拉着行李,过安检,走到地铁站,排队,购买了一张到广州南站的地铁车票,人民币8元。上了拥挤的地铁,人多,手机的噪音此起彼伏。再次戴上耳机,还是压不住,于是挪了几次座位,一直到倒了二号线,情况还是一样。路好长长,停了一站又一站还没到站。手机没电了,黄灯闪起,只好关机。直面羊城地铁车厢里实在的尘世之声。

终于终于,到了羊城南站。再次安检,进入好大好好的候车室,去二楼,吃了一排排骨饭套餐,48元。邻桌来了一群应该是韩国来的中老年游客,个个随手从包里拿出看起来还新鲜的生菜,一片一片包着米饭和排骨,津津有味地送入口中。饭后,去吸烟室,里头竟然还有小卖部,真是羊城特色。吸完烟,顺便在里头买了一瓶凉茶7元。走回候车大厅,坐着等待一个小时的剪票。

终于终于,天色就要暗下来的时候,坐上了开往桂林北的动车,隔着车窗,来了一名劳动弟兄,安顿好行李,脱了鞋子,伸出脚丫子,然后就在座椅下找手机充电插座,一边充电一边玩游戏。我于是也跟着在座椅下找到充电插座,一边给手机充电,一边记下过羊城的流水账。



蓝博洲
台湾作家

【昙花的话】甲虫

阿雷瓜(Aregua)是巴拉圭西南部一个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城市,以陶器制造而闻名,烧制和销售陶器的厂家与店家铺满街道。

在这个美丽的城市里,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:栉比鳞次的商店,家家都爬满了以陶器制成的甲虫,小者如拇指,大者如巴掌,形形色色,蔚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。

到一家工厂去参观,陶质甲虫意欲昂扬地爬上墙,趴在树上,坐在花盆里,密密麻麻,浩浩荡荡,俨然是一个甲虫的大乐园。

我问厂主安东尼:“阿雷瓜人为何如此喜欢甲虫?”他答:“甲虫在田野中随处可见,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!”我反驳道:“甲虫啃食农作物,是不折不扣的害虫!”害虫又怎么会招人喜欢呢?安东尼正色道:“我们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啊,有些甲虫,具有医疗价值,它们所分泌的一些元素,可用以治疗某些部位的癌症。鉴于此,阿雷瓜人都把甲虫当作是好运气的象征。”他又说:“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,甲虫是天赋的大好素材,你瞧,它颜色斑斓,样子充满奇趣,完全不必经过任何改造,只让它原形出现,便非常讨喜。”我说:“我们东方人绝少会以甲虫作为烧制陶器的素材……”对此,安东尼打岔道:“唉,世界就是因为同中有异,才异彩纷呈啊!”

当天,想买几只甲虫当手信,可是,整整一大箩筐甲虫,选来选去,居然没有一只完美的,有的眼睛大一一小,有的嘴巴歪向一边,有的斑点形状不一。选着选着,忽然领悟,这些不完美的甲虫,其实就体现了真实的人生……而反映现实,不就是艺术深刻的内涵吗?



杨小彦
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【横眉热对】人挪活

从几千年前发源于渭河流域的商周开始,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内外战争、朝代更替和大量移民,至清中叶,中国传统的版图终于扩张到了非机器时代的顶点,北方越过长城,深入到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荒芜之地,和俄罗斯人相遇而止。东边全是海洋,漫长的海岸线成为先祖开拓的边界。南部挺进到丛林山丘绵延的险境,止步于缅甸。再往西则在喜马拉雅山脉和印度隔山而处。往西同样是山区与荒原,新的疆域遂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边缘。

扩张的动力来自政制换代,民族融和的背后是残酷的你死我活,是人口的急剧锐减。按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,大唐鼎盛的开元天宝年间,唐政府统计全国人口为五千一百万,次年发生“安史之乱”,内战持续了五年之久。平定之后,唐政府再次统计全国人口,只剩下一千七百万。冷兵器时代,短短五年,人口居然就少了三千四百万,这个数字可是比杜甫的《三吏三别》更加让人惊心动魄,也更彰显战争的无比惨烈。

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定律,让“逝者如斯夫”成为千古一叹,无数文人为此落泪,为此伤感,为此绝望。但是,如果没有这分分合合,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维系在渭河流域一带?是否我们只能欣赏《黄河船夫曲》的悲怆与激昂,却无法领悟南音的委婉,海派的入世,以及北方的豪迈?

的确,考诸我中华历史,盛期大多热衷于定居,村舍多为熟人面孔,邻居全为亲戚家人,一旦有外人进入,警惕必成居民的一种常态。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名著《叫魂》,活脱脱再现了乾隆盛世江南村落的日常生活,然后,有一天,有外人来了,因此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、最后证明是于虚乌有的“反清”大案,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年,好不容易才稍微平息下来,让生活重新正常。

人挪活,看来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。人挪活,民族何尝不如此?



钟红明
上海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
【不知不觉】人与人的隔离带

波伏瓦在《第二性》中如是说:“如果两个情人都陷入了绝对热情,他们的全部自由就会被视为内在性……两个注定只给对方活着的情人都已死去;他们死于无聊,死于寄托本身的爱情的慢性持杀。”

从过去到现在,无论篇幅长短,情感关系是唐顾小说唯一重要的情节线。在女作家的笔下,这也是常态,但唐顾却能把握这常态风景,写出新鲜的生态,让读者感到,她最近的短篇《隔离带》也是如此。

故事的缘起,回到了1988年上海蔓延整个城市的甲肝大流行七年之后,当年“我”去医院肝炎隔离区探访男友,三米左右的隔离带,让“我”产生冲动,一步步踏入婚姻。但此后他们的家庭生活却一直笼罩在阴影里,丈夫坚决不要孩子,经常悄悄去医院做肝功能检查,过着老年人一样的规律生活,只是“我”不知道,不曾深入,他们情感关系深埋着黑暗,或者说隔离带。当“我”在闺蜜礼平帮助下,买下一套被飞机噪音终日笼罩的房子时,这对夫妻的事实上的疏离,便如走上冰面,从脚手架变成分居,离婚,层层断裂,再也无法挽回。

同样存在“隔离带”的还有闺蜜之间的关系,以前唐顾小说里,女人之间的女性同盟,是她们生存的某种支撑,然而在这部小说里,童年开始的“我”,与闺蜜礼平,却如跷跷板一样,纠缠复杂,沟壑重重。而礼平和情人华盛之间,是华丽背景下彼此保持自由,但小说写道,其实这样的情感关系,脆弱到无法打开对方的手机。从从不八卦的礼平感受到威胁,打开华盛的手机之际,她消失了,碎裂的就是双方承受的底线……

唐顾在谈到这部小说时说过:“再亲密的关系,仍然存在无法坦陈的秘密。生命的风险,不仅是天灾人祸,还有谎言和背叛。”就像小说里那个三十多岁仍然像个少女的一出现,就使各种情感关系加速崩塌,而她自己最后战胜了死亡了阴影——当年她带着男友和“我”的丈夫总是去吃毛肚,两个男人都患上甲肝,而男友死亡——她放弃了自己的生命,遁入黑洞之中。

爱情如此重要,但却最损耗人心,因为隔离带遍布。但人却不能放弃走近人心的渴望。



印象 周洁茹的三种时间

周洁茹这个名字我早知道,大学的时候。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票美女作家突然走红,美女作家是新生事物,文学背后没有一双商业的手,这为少年老成的我不喜。所以,周洁茹的名字便清晰而模糊。清晰是因为她始终是这个潮流最重要的几朵浪花之一,模糊是因为我(大概也是很多人)始终没有绕开那个潮流去关注她作为一个个体与众不同的部分。毫无疑问,称一个作家为“美女作家”,不管是真诚的恭维或社交化的打哈哈,都包含着对文学的浅薄和性别上的轻浮,这是文学市场化的结果之一。自然,之后就是这批作家的集体退场,包括周洁茹。

2015年,在穗港两地文学期刊交流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洁茹,她的身份是香港作家代表,听说她于风头正劲时离开文坛,远赴美国;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九年后又定居香港,并重拾写作。会上她,妆容,抑郁,寡言。轮到发言,她先迟疑,然后看着主席台上的周洁茹,她想说,周洁茹你并没有告诉我发言呀。我对她的语调印象深刻,面对几十上百人,她却并没有在场的其他人预设听讲者。她在自己的世界中,没有发展出一个公共的频道跟世界对话。所以,她独语,至多也是跟某个人直接对话。这种作家也不多见,不合群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,这并没有什么不好,八面玲珑、舌灿莲花的作家反而是可疑的。

会议返程,坐主办方安排的车,恰好与周洁茹同至广州东站。她依旧沉默,却不寡言。还有初次见面时少见的坦率,话题的深度超越了一次短途同车本来的可能。我印象深刻的她评价人的方式。这个人的气场已经浑厚,她说。以气辨人,既本于直觉,也说明她对于人内在洁净的要求。这样的方式是,对的人,她会很客气,请保持。此后便是在朋友圈上看她发活动、发作品、发感慨,也看到她身份从作家到编辑的转换。

2018年11月,汕头大学《人文周刊》杂志主办了一次“人文高峰论坛”,在主办方发来的会议议程中,我看到了周洁茹的名字,巧的是,她跟我同组发言,而且恰好

香港作家系列1 周洁茹:写作、文学编辑都是我真正想做的事

周洁茹,女,1976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,1991年开始写作并发表,小说作品见于《钟山》《收获》《花城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等,出版长篇小说《小妖的网》《中国娃娃》,小说集《我们干点什么呢》《到香港去》等。2000年-2009年居住美国,2009年移居香港,现任《香港文学》总编辑。

周洁茹:您新书《在香港》写到自己的一生,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第一代“独生子女”,您对“独生子女”怎么看?

周洁茹:我很少回望我过去的作品,就如同我早已不再意识到我是一个“独生子女”。茨威格说的,“她那时还太年轻,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,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。”独生子女承担所有爱,也承担所有责任。

周洁茹:您在文中提到母亲曾经下乡插队,形容自己出国留学是“洋插队”,请谈谈两代中国女性“插队”之异同。

周洁茹:我出国后每天都与父母通信,写了大概几十万字,这封信已经遗失了,但我母亲的信有五千字左右,保留了下来,发表在2001年第二期《天涯》杂志“民间语文”栏目,我也是近期才在网上找回那些文字。如果要来谈异同,我认为没有什么可比性,时代环境都很不相同,“洋插队”只是我母亲的玩笑话,我的留学生活对照我在国内时的专业作家生活是挺艰苦的,但是来跟我母亲当年的插队相比,“苦”这个字真不好意思拿出来。周洁茹:读到您写美国的散文,似乎不太想家,只是担忧未来,能谈谈那时您的焦虑吗?

周洁茹:生活很现实的,就是要拿学位啊,要找工作啊,要在美国生存下去。我在我的文章里明确了这一点。《土豆沙拉》那篇就是写的一个韩国女生,会做非常非常好吃的土豆沙拉,因为她每个周末都去旧金山上厨师学校,做菜是她最大的爱好。很多中国学生都没有爱好,没有条件,大

湾区文艺评论 洞见 由“住”激发书写的意义

周洁茹的《在香港》故事,实际触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,即文学创作与城市行走之间的关系。“住”是她提出的一个关键词。“住”,这个词,意味着什么都没干,没有海滩,没有游泳池和太阳眼镜,没有修过的美女照片和美食照发朋友圈,住,就是生活。”(《在香港》)因此,我认为理解周洁茹都市小说的准确途径有两条:一是“去”往城市;二是“住”在“城市”。

“香港不过是一个时间的缝隙,大家在这里中转,没有人会真正留在这里。我来香港的第一天也是这么确定的。要到七年以后的那一个早晨,整整七年,我突然听到‘咔’的一声,那个瞬间,我就从那里,跨到了这里。一切都发生在你的内心深处。”(《香港、英文写作及其他的话》)一座城是需要“住”下后才能完全认识的。对于城市书写,创作者和接受者其实都有先验性判断,即必然存在从外部进入内部的障碍,“融入”就是突破困难的历程。于是,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作与研究都围绕“漫游者”或“闯入者”。转眼当下,越来越年轻人在都市间的迁徙,实质是自然的过渡。故乡之外都是他乡,各个“他乡”并没有本质的差异。周洁茹一贯的创作理念是,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,我们都是要去“住”的,她的文学披露“住”的状态,与居住者的个性及行为无关。因而从这个视角出发,我认为,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香港,她并无“过客”心态。

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,周洁茹一直是都市写作的坚守者。在美国和中国香港,她不去预设“外来者”身份,抵达的同时就逐步接受。由此,我们再反观她的“到哪里去”系列,主人公是“我”及“我”身边的朋友,大家来去自由,对每个城市的感受都融化于“住”。“你对某个地方产生的情感,不过是因为那些与你有关的事情,那些你对你自己的回忆。”(《马鞍山》)居住香港已十年,她对这座城市的热情和感情皆由“住”生发,由“住”蓄养;她的香港书写意义皆由“住”激发,由“住”深入。

香港书写是写香港还是写在香港的人?周洁茹的创作策略不是专注民情风俗、地理人文,而是记录能先引发她动容的小人物或小事件。写作只关注在香港生活的人,刻意回避其身份,我并不觉得她的小说存在在外在“他者”介入的某种审视、批判或者反思,而更主要是“在场”絮语。都市小说常常将城市规划成一张思维导图,典型人物是节点,由他们向与其相关的人物扩散,这些人共同构建社区,再由社区构建城市。周洁茹的“香港”故事,首先就抛开这样的“大制作”,她从细微处经营,就一个人,就一个时刻,就一段感情。人与人是独立的个体,谁不需要刻意去“搭话”,谁都按照自己的方式“住”在香港。

同时,周洁茹的香港书写依托公共交通系统展开。每天坐上班车时,她有充裕时间去观察香港的老化速度与发车速度。《铜锣湾》是地标最密集的一部作品。它提供了香港路线图,点阵的密集转换,源自创作者长期的“住”“行”才能累积并叠加的经验。这就是很典型的日常叙事。

张英《花园》、葛蕾《旺角》、阿珍《在教》,她们的烦恼是如何能“留”在香港,而不是如何“住”在香港。周洁茹一方面写香港的速度,一方面写香港的温度。周洁茹不会强化苦闷际遇、人心险恶,而是始终将人生之“痛”故意描淡写。她依然对女性心怀悲悯,在文字里,试图让她们都能“留”在香港,都能“住”在香港。



周洁茹:没有本地朋友并不是一个问题,也不是每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都会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,我相信最坚固的友谊建立在童年时期,我的童年好友并不在香港,她是在日本居住二十多年了,但我从来不会觉得她是我日本朋友,她是我永远的好朋友。朋友没有地域差别。

周洁茹:您这本书里有一篇《大国有个火锅店》,写的是一个讲普通话的女人被讲广东话的男人无理对待的故事,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歧视的?

周洁茹:首先,“歧视”是一个很严重的词,我很少使用强烈的词。对我来说,无论是哪个地区的人,粗暴对待女性的男性都是要被歧视的,而这种男人全世界都不少见。很多歧视有地域的原因,有性别的原因,也有情绪的原因。我只有一个忠告,对待粗暴要冷静,冷静下来就数三遍一到十,如果你想要用暴力反击暴力,包括语言暴力,都不是很有效的办法。立即离开现场,是比较理智和安全的做法。

周洁茹:在香港写作、做文学编辑,与其他地方相比,有什么不同?

周洁茹:内地的文学编辑很多不用坐班,写作或者编辑,都是在家中完成。而我在香港每天都要打卡上班,朝七晚八,出门早晨七点,回到家晚上八点,我用巴士上的时间是两个小时,如果堵车,时间更长。我应该很快就到挤不动港铁坐不了巴士的年龄了。当然香港精神是活到老做到老,做得到就要做,一直做到做不动的那一天,很多的司机小巴司机都七八十岁了,仍然在工作。我从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选择,写作以及成为一个文学编辑,都是我真正想做的事。

